

# 吳濁流《胡志明》研究

河原功

日本成蹊高等學校教諭、日本大學兼任講師

張文薰 譯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 中文摘要

吳濁流之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其原題與初始版本皆作《胡志明》。在小說內容、作品結構與情節安排上，以身為台灣人而遭受之歧視、精神上的痛楚為主要題材之《胡志明》，可說與《亞細亞的孤兒》並無太大差異。但經比較後可發現，其主要相異處在於：一、主角姓名由「胡志明」改為「胡太明」。二、第二篇中胡志明心儀對象「月英」的自殺，以及其對胡志明的衝擊，在《亞細亞的孤兒》與其後版本皆刪除不見。三、《胡志明》與《亞細亞的孤兒》之字數出入，《亞細亞的孤兒》之份量幾乎僅剩《胡志明》之58%，尤其是做為主要精神所在的第四篇與第五篇，更縮減至50%以下。故《胡志明》實不可與《亞細亞的孤兒》逕以同一作品視之。

因為是以皇民化時期的台灣為作品舞台，《胡志明》中隨處可見作者吳濁流對總督府（志願兵制度、米穀管理令）以及皇民奉公運動（勤勞動員、消防訓練、挖掘防空洞、改姓名運動、廢止寺廟、廢止台灣戲曲、稻米與貴金屬之供出、強制獻金及儲蓄）的批判；反戰意識的呈現；對日本精神的質疑（如拆除後藤新平銅像）；對官吏與知識分子的批判等。更有對盲從於時勢以及假政策之

名中飽私囊之台灣人的批判；以及對於只能以旁觀者自居的作者自身的批判。在《胡志明》中，吳濁流所呈現的批判態度，其激烈程度遠超過《亞細亞的孤兒》。

透過《胡志明》，可觀察出吳濁流的批判精神實已超越時空界限，而不僅停留在「平面世界」的台灣。因此《胡志明》之中實蘊含了包括對自我存在意義探求等之深刻問題。

關鍵詞：志願兵制度、皇民奉公運動、正條密植、《亞細亞的孤兒》、《胡志明》

# The Study of Wu Cho-Liu's *Hu Chih Ming*

Author: Kawahara Isao

Lecturer, SeiKei High School & Nihon University

Translator: Chang Wen-Hsu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Wu Cho-Liu's epic *The Orphan of Asia*, the titles of the original and of the initial version are *Hu Chih 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ntent, the structure and the plot in this narrative, both *Hu Chih Ming* and *The Orphan of Asia* sharing most similarity on the main issue is that how the protagonist mentally suffered and struggled from the prejudice as a Taiwanese. However, after comparing the two works,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can be found as follows. First, the name of the protagonist has been changed from Hu Chih-Ming to Hu Tai-Ming. Second, in chapter two, the part of Yueh-Ying who is Hu Chih-Ming's beloved committed suicide and how her death severely shocked Hu Chih-Ming is removed from *The Orphan of Asia* and the versions after then. Third, the length between *Hu Chih Ming* and *The Orphan of Asia* indicates a big gap. *The Orphan of Asia* is shortened almost to 58% of *Hu Chih Ming*, particularly chapter four and chapter five as the core of the narrative was even reduced to less than 50%. For this reason, *Hu Chih Ming*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same work as *The Orphan of Asia*.

As for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this work was set in the period of imperial subject movement, the author Wu Cho-Liu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Governor-General government of Taiwan (the volunteer soldier system, the regulation of rice and grain) and the semiofficial imperial subject public service movement (labor mobilization,

fire-fighting drills, excavating shelters, the alternating name movement, abolition of temples, abolition of Taiwanese opera, the distribution of rice and precious metal, the compelling donations and savings), but also demonstrates his antiwar sentiment, his question to the Japanese spirit (for example, demolishing the statue of Goto Shinpei). In addition, he also criticizes the bureaucrats and intellectuals, the Taiwanese who just blindly follow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divert the money into their own pockets by abusing the policy and the author himself for just being a bystander.

In *Hu Chih Ming*, Wu Cho-Liu attacks much more severely rather than in *The Orphan of Asia*. We can see that Wu Cho-Liu's critical spirits has already exceeded the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 not just remaining at the level of Taiwan. Therefore, the self-exploration is another serious issue in *Hu Chih Ming*.

**KEY WORDS** : the volunteer soldier system, the imperial subject movement, the correct way for rice transplantation, *The Orphan of Asia*, *Hu Chih Ming*

# 吳濁流《胡志明》研究

## 序言——從《胡志明》到《亞細亞的孤兒》

提到吳濁流之日語長篇小說，首先想到的應是知名的《亞細亞的孤兒》。

然而《亞細亞的孤兒》之前身為《胡志明》，這是自一九四三年開始執筆，花費二年以上時間，在秘密狀態下書寫而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脫稿，共計五篇組成的作品。因其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真實描寫，更加以不假修飾之批判，故其內容在戰前必無法見容於為政者，在那甚至是只要執筆活動被得知就會被視為政治犯處以逮捕、監禁甚至下獄刑罰的時代，正可說吳濁流是以己身性命為賭注寫下此部作品<sup>1</sup>。此作在戰後即刻出版，由立石鐵臣裝訂<sup>2</sup>，以《胡志明》為書名分五冊出版<sup>3</sup>。其出版狀況如下：

<sup>1</sup> 在《アジヤの孤兒》(一二三書房，昭和31年4月15日)的「自序」中有以下說明：「《アジヤの孤兒》這本小說是在戰爭期間，也就是1943年起筆，1945年脫稿的作品，只是記錄了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史實的一部分。然而卻也是將當時誰也不敢執筆的史實，用毫無顧忌、真實描寫手法留下的作品。……且不論這篇小說寫得好不好，其中尤其是第四、五篇，對筆者而言真是用命換來的作品。」

<sup>2</sup> 當時立石鐵臣以台灣省編譯館編輯的身分被留用。編譯館所留用的日本人尚有素木得一(前台北帝大名譽教授)、淺井惠倫(台北帝大教授)、國分直一(台北師範教授)、池田敏雄(公學校教員、情報部勤務、《民俗台灣》編輯)以及立石鐵臣等九位。參見台灣協會所藏，《地域別台灣省繼續留用者名簿》、《地域別台灣省繼續留用者名簿》，《台灣引揚・留用記錄》第8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8年1月)，頁21、197。

<sup>3</sup> 《胡志明》各冊分別記載有其脫稿日期。第一篇：1943年4月22日，第二篇：1944年9月16日，第三篇：1944年12月1日，第四篇：1945年4月3日，第五篇：1945年6月22日。

第一篇		國華書局	民國 35 年 09 月 03 日 10 月 10 日 (二版)
第二篇	悲恋の巻	國華書局	民國 35 年 10 月 10 日
第三篇	悲恋の巻 (大陸篇)	國華書局	民國 35 年 11 月 20 日
第四篇	桎梏の巻	民報總社	民國 35 年 12 月 25 日
第五篇	癡狂の巻	學友書局	民國 37 年 01 月 10 日

從第一篇到第四篇的出版時期皆約僅間隔一個月而順利刊行，到了第五篇卻隔了一年以上。因第五篇中可見「脫稿於 1945 年 6 月 22 日」字樣，可知出版日期延滯是由於發行時遭受阻礙，亦即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影響。或因如此，即使《亞細亞的孤兒》之前身為《胡志明》一事廣為周知，但《胡志明》共分為五冊的狀態以及其內容卻幾乎完全為人所忘卻。甚至「第五篇癡狂の巻」長期以來被認為已經散佚<sup>4</sup>。其後對重刊《胡志明》之呼聲雖然時有所聞，但卻因為在台灣不得出版日文書籍等因素而始終不得實現。結果是經過八年後於日本，以書名《アジアの孤兒》於一九五六年出版；翌年再改題為《歪められた島》重刊；一九七三年重新裝訂後刊行決定版《アジアの孤兒》。其發行狀況經整理如下：

《アジアの孤兒》	一二三書房	昭和 31 年 04 月 15 日
《歪められた島》	ひろば書房	昭和 32 年 06 月 01 日
《アジアの孤兒》	新人物往来社	昭和 48 年 05 月 25 日

戰後第一次於日本出版《亞細亞的孤兒》（《アジアの孤兒》），是在吳濁流好友上野重雄奔走之下，與一二三書房（中澤富美雄）協力下方得實現<sup>5</sup>。出版

<sup>4</sup> 如呂正惠在〈被歷史命運幡弄的人們——論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陳義芝主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1999 年 6 月），頁 19）註釋中記述：「僅出四冊，第五冊因受二二八影響未能發行」。然而如以上所述，第五篇確實曾刊行。關於出版時期延誤的原因，吳濁流自身說明：「本篇運氣不好，遇到二二八事件，因而在倉庫裡沉睡了十個月。對於前來詢問理由的讀者，當時無法一一回答甚感抱歉。」（第五篇，頁 79）

<sup>5</sup> 在一二三書房版《アジアの孤兒》（1956 年 4 月）的「自序」中提到：「對於協助出版的兩位好友上野重雄、中澤富美雄的友情與犧牲，必須致以謝意。／而關於本書的出版，十年如一日關懷筆者的工藤好美教授所給予的精神上的支持，使我思之淚落，同時也對先生的文學熱誠大為感佩。／1956 年 1 月 10 日」（底線為筆者所加）。而經詢問下發現，

後不久中澤富美雄過世，因此再版是由ひろば書房（神田孝一）處出版。將書名改為《歪められた島》，由立石鐵臣擔任裝訂工作。外型上《歪められた島》看似是與《アジアの孤兒》迥異之作品，然而內文版型沿用一二三書房版，因此內容完全相同。經過十六年後，於一九七三年春再由新人物往來社出版決定版《アジアの孤兒》，日本當時以戴國輝（時任亞細亞經濟研究所主任研究員）為中心之台灣研究聲勢正盛，《亞細亞的孤兒》決定版的出版正是由戴國輝與新人物往來社交涉合作下的成果<sup>6</sup>。

由上所述，吳濁流日語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事實上存在著包括台灣出版之《胡志明》，日本出版之《アジアの孤兒》、《歪められた島》、決定版《アジアの孤兒》等四種版本。中文版更有包括楊召憩翻譯《孤帆》（高雄：黃河出版社，1959年6月）、傅恩榮翻譯《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南華出版社，1962年6月），與廣鴻文出版社、遠行、前衛出版社等種種版本。

目前只要提到吳濁流之代表作，任誰都會馬上想起《アジアの孤兒》也就是《亞細亞的孤兒》，而關於此作之研究成果亦甚多，惟不見關於其最初版本之《胡志明》研究，這正是今日之吳濁流研究中所必須補全之處。

本論文將以《胡志明》為關注重心，舉出其與一二三書房版《アジアの孤兒》之相同與相異之處，以解析《胡志明》中吳濁流所寄寓之訊息。

## 一、《胡志明》創作之經緯

關於《胡志明》創作之經緯，從第一篇到第三篇皆不見說明，甚至沒有作者介紹。直到第三篇開頭處，吳濁流預告曾至日本留學之胡志明將赴大陸，而

---

現在東京的同名出版社「一二三書房」（1951年12月3日創立），與出版《アジアの孤兒》的一二三書房並無關連。

<sup>6</sup> 新人物往來社版《アジアの孤兒》（1973年5月）的「自序」是沿用一二三書房版《アジアの孤兒》，只是再加上作者的「寫於重刊之際」。「寫於重刊之際」中說道：「距作品執筆已過三十年的歲月。此間本書分別在台灣與日本出版。於日本出版當初往來奔走的中澤富美雄、神田孝一氏都已成故人，實在感慨萬千。謹向在天之靈的二位致上敬意。這次由新人物往來社的好意重新出版，經過最後的修訂後製為決定版。／最後謹向策劃本次出版，並惠予校閱與解說的戴國輝博士致上深刻謝意。／1973年3月6日」（底線為筆者所加）。另外戴國輝也在向社會思想社提議，出版吳濁流選集《夜明け前の台湾》（1972年6月）與《泥濘に生きる》（1972年11月）一事上有貢獻。



「他將在彼方看到什麼？做什麼？」，並交代「《胡志明》共五篇，恨不得早日將其全貌呈現給讀者諸兄，但因種種原因不得如願。此後還有兩篇，這第四、五篇將是胡志明之中心思想所在」。

因此《胡志明》創作之經緯，是在第四、第五篇中見其分曉。

第四篇之開頭處，作者敘述了必須冒著被對門北警察署發現惹禍的危險，寫下《胡志明》的辛酸，此段文字與《アジヤの孤兒》等版本中之「自序」的內容是相同的。

當時我的居處前正聳立著北署的官舍。其中也有二三位打過照面的特高警察。寫到《胡志明》的第四篇時正是敏感所在，不能不多加戒懼。但同時又覺得危險之處可能反倒安全，於是想出一些措施以防萬一。

寫好二三張後就藏在不起眼的炭籠中，等累積一定數量後再送到鄉下，為求免於萬一之禍而作了種種努力。現在看來雖屬無謂，但當時卻是得步步為營的時代，如果作了什麼被發現，無論動機如何都會被貼上反逆者、反戰者的標籤而遭到處罰。然而在歷史整個反轉過來的今天，這些無謂的犧牲看來皆令人啼笑皆非。

但即使如此，在當時對於未來完全無法預知，在空襲日趨激烈的狀況下，隨時隨地都面對著未知的命運。想來就是在這樣對未來的無可掌握下，更激起必須完成《胡志明》的意志。

在第五篇的開頭處也明示曾告知台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胡志明》之執筆作業，也正因為得到工藤教授之激勵才能堅持《胡志明》之寫作。

是在開始寫《胡志明》後過了一陣子的事情。一開始我只打算寫第一篇，但給工藤好美教授過目後，反而他表現得比我還要積極，希望我繼續寫第二篇。我本來就不是文學專家，也不是可以寫作文學的料子。但工藤教授推薦我許多的參考書籍，特別要我讀巴爾札克的作品。只是本人生性疏懶而未予閱讀。卻是在教授的期許下持續寫了第二篇、第三篇。在教授將回日本前夕，我們一邊吃著山羊鍋一邊談論文學。當時先生要我



答應他三件事：第一是一定要完成胡志明，第二是將其以中文譯出，第三是用羅馬字標音自己的語言重新寫過。不只當夜，教授回日本後亦常來信鼓勵筆者。感於教授的熱誠，筆者完成了第一項約定，但第三項卻遠非能力所及，剩下的第二項是希望能努力達成的。

吳濁流告知工藤好美關於《胡志明》之執筆作業，應是在「1943年4月22日」第一篇脫稿之後不久。當時也正是吳濁流以「南京要人印象記」為題，寫下自己在中國大陸之體驗與見聞，在《台灣藝術》雜誌上連載之時期。

## 二、關於《胡志明》之內容

小說《胡志明》是由主角「胡志明」於書房學習的童年時代展開序幕。書房關閉之後胡志明進入公學校、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畢業後胡志明任職於 K 公學校，在感到從事兒童教育的欣喜之同時，也看到身為台灣人教師而遭受歧視的不公，以及日本人教師對台灣兒童的虐待，痛苦油然而生。胡志明對日本女性教師「內藤久子」抱有好感，卻在鼓起勇氣告白之際，被以「你是本島人，不是嗎？」的話語拒絕。胡志明因而產生到日本內地留學的意念。以上是第一篇的內容，在小說《胡志明》中，吳濁流豐富呈現了因身為台灣人所遭遇的歧視與所承受之精神苦難。

第二篇則描寫胡志明的東京經驗以及歸台後的生活。在東京的四年期間，對於胡志明而言雖有不能公開自己台灣人身分的禁忌，卻也有與房東女兒「鶴子」之間的融洽相處，以及得以全心追求學問的充實體會。然而回台後的胡志明，卻在鄉民與親戚的期望中反而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寂寞」，無法順利就職的胡志明懷抱「不僅失去了青年應有的遠大夢想，甚至連人生的希望都要喪失」的失落感，甚至開始否定自己的內地留學經驗。在兄長所提議的分家、分財產等事件中胡志明多次被傷害，低潮中結識了「月英」，一度欲著手籌措聘金以迎娶她，「月英」卻因為被綽號「糖扞仔」的地痞奪去貞操而悲憤自殺。胡志明認為月英之死「都要歸罪於自己」而感到「良心的苛責」，自己一度亦欲輕生。在傷心的情緒影響下，胡志明欲求得以安身立命之場所而決意赴大陸，以上是第二篇的內容。

第三篇則是在抵達上海後的胡志明眼見盜賊、乞丐、遊民四處充斥，而心生「上海並非善居之地」的厭煩感開始。轉至南京後，胡志明又目睹中國婢女以洗過痰壺的布巾清洗餐具、大庭廣眾下刷洗夜壺、女性公然便溺的場面，對於這些缺乏衛生觀念、禮儀的狀況流下「悲哀感傷的淚水」。之後胡志明成為日語學校教師，與蘇州美女「陳淑春」互生情意進而結婚。然而淑春卻不願為家庭所束縛而至外交部任職，熱衷於政治活動與麻將、流連於舞廳，不顧家事與家庭教育，使胡志明大為煩惱。同時期的中國正是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內戰正盛之時，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一個夜晚，胡志明因為台灣人身分而被特高警察帶走拘禁。幸運的是特高科長的妻子正是自己從前的學生，胡志明因而得以逃脫至上海。然而到了上海以後，卻發現上海是「比想像中還要紛亂」的狀態，「日本籍民被殺害」的謠言漫天，「台灣人失蹤人口與日俱增」、「租界的台灣人先後被日本官憲所逮捕」，險象環生。到了五月底，胡志明「無可奈何之下決心歸台」，隻身搭乘開往台灣的船隻。到這裡，胡志明雖至東京留學，也曾至大陸，但只因為台灣人的身分而飽受猜忌警戒，因而遍尋不得安身立命之所在。

在第四篇中，背景為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被波及捲入戰爭狀態的台灣。在這個時代中，台灣人被要求包括黃金、白米的供出、農田的正條密植、強迫應徵志願兵、改姓名、禁穿台灣服、廢止寺廟、禁止台灣戲劇、禁止台灣音樂等精神上物質上的強制收編。胡志明在同情苦於壓迫榨取之台灣人的同時，也批判包括像己身兄長般擔任皇民化政策推動前鋒的台灣人，以及隸屬地方行政基層而欺壓台灣人的日本人。在苦惱的同時，胡志明也不斷找尋精神上的依歸。

第五篇即是描寫太平洋戰爭開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後的狀況。「特別志願兵制度」被大力宣傳，台灣青年也陸續被強迫應召，無論男女老幼都必須頻繁的被要求奉公動員。名目或者是戰鬥要員，或許是勞動戰士，台灣人被大量的驅遣動員，其層面已經由物質到精神，甚至泛及人力層次。市民生活越趨艱困，在物資欠缺的情況下，種種生活必需品都必須經由配給制度，人民的儲蓄與獻金都在強制下進行。官僚以及周邊人員的氣焰高漲已經到了令人難忍的地步。至此胡志明對皇民化政策、皇民奉公運動、官吏與知識分子的批判，對反

戰意識的表出、對日本精神的懷疑隨處可見。最後因勤勞動員而死的弟弟志南的刺激下，胡志明終於發狂。

以上自小說內容、構造、情節開展來看，《胡志明》與《亞細亞的孤兒》之間可說未有太大差異。若要具體指出相異之處，則最明顯的應是主角姓名由「胡志明」改為「胡太明」。「胡志明」這個名號最為人知的，應該是北越領導者、越南勞動黨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國首任總統的 Ho Chi-Ming (1890.5~1969.9) 胡志明。胡志明在戰前曾為肅清共產黨勢力中的國民黨所逮捕下獄，戰後則挺身呼籲國民與法軍抗戰。以與共產主義者兼革命家的「胡志明」同名男性為主角，甚至以「胡志明」為書名出版，即使是在日本，對於當時厲行反共政策的國民黨政權而言，都是難以容忍的。為了避免誤會甚至招致災禍，吳濁流採取了將主角改名為「胡太明」的策略。

此外在第二篇中，胡志明已思及與其婚嫁到張羅聘金階段的「月英」的自殺，以及對於胡志明的衝擊，此點皆不見於《亞細亞的孤兒》以後的諸版本，是由作者吳濁流之手直接刪除。此部分後來獨立為短篇小說〈糖扞仔〉<sup>7</sup>，然何以吳濁流會將這在第二篇「悲戀之卷」中具有決定性地位的情節刪除？對於此點，吳濁流本人曾解釋：

此篇原來是「亞細亞的孤兒」中的一節，因在日本出版時，嫌其累贅，故加刪割。可是，由此短短的文字中可窺見臺灣淪陷時期的御用紳士的醜相，所以翻譯出來作為獨立的短篇。(吳濁流，《吳濁流選集小說》(台北：廣鴻文出版社，1966年12月)，頁245)

<sup>7</sup> 〈糖扞仔〉本來是《胡志明》第二篇中的一個故事，描寫本區有力人士、身兼「協議會員、保正、壯丁團長等榮譽職」的「糖扞仔」的惡態，以及成為其犧牲品的「月英」。其內容如下：所謂「糖扞仔」是指砂糖檢查官用來檢驗砂糖品質的棒子，因為「每一袋砂糖都得置入檢驗」，做為人的綽號則是指他「只要是新面孔的女性都要染指」。「糖扞仔」先是染指麵店「醉仙樓」中的新女侍「三妹」，但真正的目標則是該店的女兒「月英」。先是提供月英學費，又與其母親共謀潛進月英的寢室。逃過一劫的月英找胡志明妹妹「秋雲」商量對策，胡志明於是在月英於胡家避難的期間愛上月英。胡志明為了迎娶月英而到處籌措聘金，然而卻被月英母親所拒，二人在月英母親的計謀下分開，因為月英能從女學校畢業，是早先「糖扞仔」以將來納月英為妾的條件與母親協定而來。月英終於在母親的計策下遭「糖扞仔」染指，留下給胡志明的遺書投水自殺。胡志明自責月英之死是己身所致，一度意欲自殺，卻在看到平交道旁的注意標語而止步。

這段說明的文字十分簡略，然而胡志明因為同情月英身世甚至為其張羅傳統習俗的聘金結婚的行為，與作品中對胡志明的憧憬新時代之設定，乃至吳濁流本人的觀念產生矛盾，因而成為《胡志明》中的破綻，或許正是這段無法存在於《亞細亞的孤兒》中的原因。

### 三、《胡志明》與《アジヤの孤兒》之字數出入

字數的大幅出入，可以說是《胡志明》與《亞細亞的孤兒》之重要差異。以下是各篇的文字數：

	《胡志明》	《アジヤの孤兒》
第一篇	69,300 (45 字×20 行×77 頁)	47,840 (26 字×20 行×2 段×46 頁)
第二篇	68,400 (45 字×20 行×76 頁)	36,400 (26 字×20 行×2 段×35 頁)
第三篇	70,200 (45 字×20 行×78 頁)	48,880 (26 字×20 行×2 段×47 頁)
第四篇	74,448 (47 字×22 行×72 頁)	36,400 (26 字×20 行×2 段×35 頁)
第五篇	78,936 (46 字×22 行×78 頁)	39,520 (26 字×20 行×2 段×38 頁)
總字數	361,284	209,040

《胡志明》之總字數為 361,284 字，而《亞細亞的孤兒》之總字數則為 209,040 字。雖然這只是以「字數\*行數(\*段數)\*頁數」的粗略方法，而並非以精密的計算方法所得出之結果，可能多少存在誤差，但整體來看，《亞細亞的孤兒》要比《胡志明》少了約 152,000 字左右，也就是減少至約 58%。其中第四及第五篇部分，更令人訝異的減少了 50% 以上。對於其原因，吳濁流本人曾提起是因為在日本出版為了節省紙張，因此才大為裁減篇幅<sup>8</sup>，但這樣的規模仍使人意外。

因此，不能僅是將《亞細亞的孤兒》視為《胡志明》之精華版，甚至將二者視為同一作品，而有必要從內部來檢視其確實內容。

<sup>8</sup> 在《アジヤの孤兒》中大幅削除的部分，在傅恩榮翻譯《亞細亞的孤兒》時已恢復原貌，對此，吳濁流說明：「這篇小說在日本出版時，為節省紙張關係，刪削很多，所以這次又再加入，並改訂多少，暫為定稿，才著手翻譯而付梓，於今，始與讀者見面……」。(吳濁流著，傅恩榮譯，〈由日文翻譯中文出版的經過〉，收於《亞細亞的孤兒》(台北：南華出版社，1962 年 6 月)。

附帶一提的是，在一二三書房版的《アジアの孤児》之後所出版的ひろば書房版《歪められた島》，直接沿用了一二三書房所製作的版型，因此在字數及內容結構上完全相同。而新人物往來社版《アジアの孤児》則是以一二三書房版本為底，再加上吳濁流本人親自修訂而成之決定版。在排版上則改以 43 字\*19 行，共 292 頁，即使多少有所變更，但實際字數與內容都與一二三書房版所差無幾。

因此可知，在內容上呈現大幅度相異的，只有於台灣出版的《胡志明》與東京一二三書房出版的《アジアの孤児》二者之間。

#### 四、皇民化政策與皇民奉公運動之實態

吳濁流曾在《胡志明》第三篇的開頭處言及「第四、五篇為胡志明的中心思想」。小說《胡志明》中第四篇與第五篇皆是描寫皇民化時期的台灣，因此胡志明的批判與不滿隨處可見。

所謂皇民化政策是為了讓日本精神滲透入台灣人心靈，強迫其接受崇敬神社、皇室等觀念，樹立國民意識，以使台灣人為了日本國家而犧牲奉獻。其範圍甚廣，包括使用日語、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干涉、強迫獻金與儲蓄、黃金、白米的供出等經濟層面的壓迫、禁止傳統宗教、改姓名、強迫應徵志願兵等都在其中。在政策陸續推出的情況下，台灣人也必須一一服從。

##### \* 皇民奉公會的結成

在其中擔任實際執行的即為「皇民奉公會」（一九四一年四月結成）。所謂的「皇民奉公會」是以內地之大政翼贊運動為精神指標，要求住在台灣的「內地人」、「本島人」、「高砂族」等分別在各自的崗位上實踐「臣道」、翼贊「大政」，是以確立高度國防國家之體制、建設東亞共榮圈為目的的國民性組織。然而「皇民奉公會」並不是具獨立性質的民間組織，而是與行政機關之間完全密合，表裡一致。此點可從其總裁為台灣總督、中央本部長為總務長官、地方支部長（州、市、郡、街、庄）皆由各地行政廳長官兼任即可知。簡言之，「皇民奉公會」是



以總裁（結成時為台灣總督長谷川清）為頂點，以「中央本部」（本部長為齋藤樹總務長官）為主導單位，其下為「州廳支部」（以各地州知事與廳長為首）、「市郡支會」（以市長、郡守為支會長）、「街庄分會」（以街庄長為分會長），可說與行政單位的劃分完全重合。市支會下尚設有「區會」、街庄分會下尚有「部落會」，最小單位則為「奉公班」。從中央本部到奉公班，呈現金字塔型的組織。而「奉公班」之組織原則為「市則以八十戶上下為單位、街庄則以甲為單位來劃分」（區會部落會等整備要領），全台共有約六萬五千班，此則完全以支配統治台灣人的「保甲制度」重合。從以台灣總督名義發給各州廳的訓令八十二號「奉公會的下部組織」（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中，列舉下層組織之整備與實際成就加以肯定一事亦可知，「皇民奉公會」即使不是明文隸屬於總督府的機關，但卻也是以「將統治之意圖正確無誤的下達於島民」為目的之監視統合島民身心的機構。

即使本質如此，擔任「皇民奉公會」宣傳部長的大澤貞吉，在其所著《皇民奉公運動早わかり》（皇民奉公運動簡要手冊）中，特別強調「皇民奉公會」並非官方機構。

皇民奉公會本來就不是官方所創、亦非法律強制規定的機關。而是六百萬島民為順應時局、基於燃燒的熱情而自主結成的團體。因此並不具有強制力或處罰規定，而是大家在共同的組織下，齊心協力邁向臣道實踐的大方向。也正因此，如果不時時戒慎努力，那麼邁向大方向的隊伍也無可避免將會失序、前往的方向產生偏差、甚至出現落伍者。（《皇民奉公運動早わかり》（台灣總督府情報部，1941年7月），頁24）

大澤雖然強調「皇民奉公會」「並不具有強制力或處罰規定」，但是在結成過程中總督府與台灣軍的強力運作，組織型態又與「保甲制度」相重合，可想見在軍部與警察的監視目光下，是不可能真的沒有所謂「強制力或處罰規定」的。這一點不只是台灣人，甚至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應該也是心知肚明。

## \* 皇民奉公會的活動

以青年為對象的軍隊訓練、為求增進生產而在各業種的產業戰士的練成、對十五歲以上未婚女子的訓練、對中年以上百姓的一般訓練等，是由「訓練部」所擔任。

而生產調整、配給、節約消費、勤勞奉仕、強制儲蓄、黃金硬幣鐵製品等之供出等，與島民生活直接相關的事務由「經濟部」擔任。特別是儲蓄年度目標金額年年提高，一九三九年度為一億圓、四〇年度驟增為二億、四一年度二億五千萬、四二年度三億五千萬、四三年度則為四億圓等，台灣島民的生活日趨逼緊。

別於「皇民奉公會」的組織「奉公壯年團」與以年輕女性為對象的「桔梗俱樂部」（一九四一年七月），亦在皇民奉公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使台灣島民的身心完全為總督府所控制。

「皇民奉公會」在翌年一九四二年八月為求翻新機能，廢除地方部而設立以「普及民眾娛樂」、「促進文化向上與整備文化機關」為目的的「文化部」。這是以動員文化人士使其積極協力皇民奉公運動，以及進一步激起島民之皇民奉公意識為主要目標的機構。其中設台灣文化賞（包括台灣文學、台灣詩歌、台灣文藝功勞、台灣音樂、台灣演劇賞等五項）。一九四三年四月則以擴大的形式解散全島規模的「台灣文藝家協會」，而在旗下另設「台灣文學奉公會」。於同年十一月由「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文藝台灣》發行人西川滿主張「雜誌獻上」，因此導致不僅《文藝台灣》本身，連當時與《文藝台灣》對立的季刊《台灣文學》（張文環主辦）都面臨停刊的命運。

## \* 《新建設》創刊

「皇民奉公會」企求機能翻新之影響也廣及「宣傳部」的事務：為推進皇民奉公運動的宣傳機關雜誌月刊《新建設》，在一九四二年十月由中央本部創刊<sup>9</sup>。為求能夠度過日趨緊迫的時局，將中央本部的意圖「正確無誤下達」、同

<sup>9</sup> 關於皇民奉公會與其機關雜誌《新建設》，請參照拙論，〈『新建設』解題〉（東京：總和社，2005年2月）。



時將島民的心意「圓滑順暢上傳」以促成台灣全島民的團結一致、齊心協力的必要性與日俱增。使台灣人忘卻台灣意識，以日本精神取而代之，而能在動員皇民化後的台灣人時更加順利是宣傳部的目的所在。因此《新建設》創刊之意義不容忽視。為求呈現「內台一如」，眾多文學相關人士、知識分子、台灣有力人士皆與《新建設》結緣。

楊雲萍於其中連載小說〈部落日記〉。透過從事「模範部落」建設與指導工作的「我」的視線，以及與「綠蘭」之間的戀愛，生動描寫出皇民奉公運動是如何滲透進入台灣農村社會。為求提升農作物生產量而進行的肥料製作與正條密植、農村社會中殘留的迷信風俗、為了武器與火藥製作而回收硬幣的實況、農忙時期對女子挺身隊員的動員、青菜供出與配給、轟炸機空襲與戰爭死亡傷害保險等，作品中滿載貼近生活現實的題材，實質上對皇民奉公運動的推進作出貢獻。

在詩歌方面，有矢野峰人（台北帝大教授、詩人）發表〈米英擊滅の歌〉、〈出征將士を送る歌〉、〈大詔奉戴日の歌〉、〈若鷺にあたふる歌〉、〈出陣の學徒に〉等作品。也有西川滿的〈新建設〉、長崎浩的〈新しき世紀の序曲〉、〈僕らの誓ひ〉等。其中皆洋溢著高揚的戰爭情懷。

此外還有訪問記如吉村敏〈つはものの家報道記一山の勇士の遺族を訪ねて〉、濱田隼雄〈兵隊と子宝一員林の重村家を訪ねて〉、新垣宏一〈台南州玉井庄に兵の母を訪ふ—陳蔡丹さん語る〉、長崎浩〈吾等は陸軍二等兵—工作隊訪問記〉等，都是足以喚起愛國與忠誠心，對於推動皇民奉公運動不可或缺的記事文章。而台灣人作家也同時被動員寫出如周金波〈現地報告—不言の内台一如『サクラキさん』を訪ねて〉、張文環〈松岡曹長の遺家族を訪ねて〉、呂赫若〈現地報告—妻ありて兵強し新しき誇り〉等文章。此外尚有曾讚美志願兵制度的高山凡石（陳火泉）之〈晴れの首途に餞ける言葉—生けるしるしに〉、楊氏千鶴〈日章旗の下に〉。連曾活躍於台灣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運動的楊達也寫出〈常會團樂論〉。

也有可見「奉公」字樣的俳句、短歌、川柳等，不僅是日本人、連台灣人都有相當多的喜好者，紛紛將其創作投稿至雜誌上。

口號本身也處處可見，「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所徵集之「決戰標語」獲選者為張步升的「白亞館つぶして建てよ忠靈塔（拆了白瓦洋房蓋忠烈祠吧！），「軍援標語」入選者則為劉昌仁的「遺家族に憂ひ持たすな隣組」（街坊們！別讓遺族有所操心！），於一九四三年九月刊載。

台北帝大的教授群們也陸續在其中執筆，包括早阪一郎〈共榮圈建設の理念〉、中村哲〈国体精神と大東亞精神〉及〈国体明徴運動は日常の職場から〉、安藤正次〈国体の本義を語る〉、〈こゝろの要塞〉、淡野安太郎〈『いへ』の新建設〉、中井淳〈工作には有機的な連関を〉等文章都建構起皇民奉公運動的理論體系，承擔了提升皇民奉公運動之品格的任務。

另一方面，曾在台灣文化運動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林獻堂也被捲入這股洪流中，雜誌刊載了其訪問記錄〈有識層陣頭に起て〉，是一篇以籠絡台灣人為目的的記事。

本誌大量刊載了關於皇民奉公運動的解說、座談會、基層組織之活動內容，亦包含圖片之欄位；再加上關於生活部、經濟部、訓練部等之動向，與青年團、壯年團、桔梗俱樂部、大日本婦人會等之動向，以及演劇協會與紙上劇團協會等動向；可知《新建設》並非僅是「皇民奉公會」之機關雜誌，更發揮了全面宣傳皇民奉公運動的功能。

## \* 對強迫台灣人服從與忍耐的皇民化政策之批判

對於皇民化政策、皇民奉公運動，吳濁流的目光是冷峻的。他批判強迫台灣人忍耐與服從的日本精神，以及皇民化政策本身。吳濁流在《胡志明》中列舉許多實例，而其份量更大幅度超越了《アジヤの孤兒》，並且更為具體。

### （一）勤勞動員

胡志明在路上目睹了為數約二百名的奉公班，他們衣裝殘破、背負著鐵鍬、棉被、飯鍋等器具。他們「無論男女老少，看起來都憔悴無比，像是即將被屠宰的羊群。他們好像是被徵召到公用地的一群」；而「胡志明看了他們以後更覺得戰時下的本島人真是悲哀到令人不忍卒睹。」（第五篇，頁14）

而當胡志明本人面臨被勤勞護國動員令徵召之際，看到胡志明的農民卻也感歎：「連那樣蒼白瘦弱的傢伙都要被動員。」（第五篇，頁 46）

抵達故鄉車站的胡志明與來自鄰村的女性同行。女性敘述自身遭遇：本有二個兒子與一個女兒；女兒因女子青年團的動員被徵召去採砂，在高熱的工作環境中因疲勞與骯髒而死；長子現在到高雄百日奉公，從事危險的工作，實在令人無法放心；次男則應警備召集，面會時看到他因為過度勞動與飢餓「不到一個月就顴骨高聳、目眶凹陷」（第五篇，頁 59），也令人擔心。對於這幾近要失去所有子女的婦人，胡志明寄予無限的同情，也同時對以不人道方式進行勤勞動員的皇民化政策進行批判。

## （二）消防訓練與防空洞

從大馬路走進小巷，胡志明目睹了家庭防火群的消防訓練，當時指導員對他們敬禮與舉手的方式多加挑剔。一旁的日本人佐藤對胡志明說道：「其實只要能滅火就夠了，舉手的方式根本沒有差別吧」、「對於科學的力量還用這種原始的滅火方法，指導員居然還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真是可憐啊」。（第五篇，頁 38）

佐藤更指著防空洞，批評其不科學、以及日本人幼稚的精神主義。

這根本就是墳場。萬一遇到機關槍掃射會怎麼樣呢？要言之，日本人喜歡機械式的行動，完全不知變通。這個防空洞正是如此，要市民在一個星期內挖好，市民也只好像瘋了一樣拼命挖。當局認為這是所謂一億一心的體現，全不管這種東西到底有沒有用。在這麼狹窄的地方到處挖防空洞，如果真的發生火災，消防車要怎麼進來？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性格，種種不科學的現象正導因於精神主義。不過這種幼稚的精神主義，也會隨著這次大戰而修正吧。（底線為筆者所加。第五篇，頁 38）

## （三）廢止寺廟、傳統戲曲、傳統音樂

當廢止寺廟的命令下達時，擔任保正的兄長胡志剛「對保甲民大聲宣布天神、天師、恩主、關公、媽祖、義民等都是支那的神明，應該馬上廢止」（第四

篇，頁 41)，而志剛本人也率先「廢止了代代相傳的，供奉在家廟的眾神明」。但胡志明對虔誠信奉媽祖的母親說：「寺廟廢止只是國民運動，總督府都還沒有貼出告示。而且憲法保證人民信教自由，所以是不會被罰的」（第四篇，頁 42），讓母親藏起媽祖神像。胡志明認為：

先否定神明的存在，又要人改信日本的神明，對於這種思想上的矛盾，那些寺廟廢止論者都不會覺得奇怪嗎？本來宗教運動的原則都是對其他神明採取批判態度，對於神的存在本身是不會加以否定的，因此這種推行法是很難成功的。結果正如他所預料，不了了之。（第四篇，頁 43）

之後，從寺廟與家庭中蒐集而來的媽祖神像都被寂寞地陳列在帝大與博物館、而其中「有藝術價值的雕像則成了有力人士的私人收藏」的謠言滿天飛。更有「政府只是藉著寺廟廢止的名義要侵占廟產」的說法。在生活改善名義下的寺廟整理運動，事實上是剝奪台灣人的信仰自由以全面推行神道，以及對於廟產的侵占罷了。

在寺廟廢止的同時，傳統戲曲、音樂也成為被排斥禁止的對象，台灣人連娛樂的自由都被剝奪。胡志明卻同時察覺「明明與中國進行決戰，卻沒有半個人出來提倡要廢漢字，這太不可思議，也令人懷疑日本人的自相矛盾」（第四篇，頁 43）。

#### （四）經濟與時間的榨取

對於獻金與勞役，則以興建大阪城的豐臣秀吉為例，批判那不啻是「消耗台灣人經濟實力的政策」。

即使可以平安的度過戰爭，貧窮關卡卻很難熬過。就算不說國防獻金，○○獻金、○○勞役、○○奉仕、學校增建的募款等等，都是趁著戰爭巧立名目的政策。說穿了就是要在經濟上、時間上讓台灣人喘不過氣。在這種非常狀態之下，明明培養民力，以企求戰鬥力的增強是第一要務，為什麼要這樣的讓人民來回奔走呢？他忽然想起了興建大阪城的豐臣秀吉的策略。豐臣秀吉發現天下諸侯的實力有日趨擴張的傾向，因而要求

其協助興建雄偉的大阪城，以達到消耗諸侯經濟實力、使其失去力氣的策略。他想到現在種種的動員，原來也是同樣策略下的產物，不僅恍然大悟。同時也驚異所謂的政治家居然有種種不為人知的小手段。(第四篇，頁 49-50)

### (五) 米穀管理令

胡志明開米店的朋友，拿著報紙向胡志明敘述米穀管理令，分析米穀管理令是一種「抑制米價以促使農業人口轉向勞動工作的手段」。為了獲得多數的勞動戰士，不惜要求農業從事者作出犧牲。

米是不可能過多的。看看現在日本內地還在進口外國白米就知道了。簡言之米穀管理令是為圖台灣工業化而想出來的惡毒手段，其中涵蓋了獲取低廉勞力的當局的意圖。只要抑制米價，就能使農村人口轉換為勞動人口。米穀管理令是當局一石二鳥的政策，在能夠促進糖業發展的同時，也可以製造出更多的勞動者。而農民以血汗換來的白米，其生產價格的一半上都進入當局的口袋了。(第四篇，頁 13)

### (六) 正條密植

在中國戰線日漸擴大的戰局中，做為前線基地的台灣則以糧食增產為其優先任務。其具體策略之一的「正條密植」，是一種稻田秧苗的種植方式。而胡志明對於為達成增產而堅決施行正條密植抱持著反對態度。所謂的正條密植，是指強迫農夫放棄長期累積經驗而得的耕作方式，接受技手指導的「間隔縱二十一糶，橫二十糶」的規定。被技手命令必須重新插秧的農夫一氣之下，不惜讓已植下的秧苗毀於耕牛鐵蹄踐踏。目睹這種畫面的胡志明想到：

雖然對農業沒有專業知識，但是台灣全島真能藉此而達到預期的目標嗎？深山的田怎能與平地稻田用同一套標準來耕作？中部地帶的平原與山地梯田也不可能一樣。技手們也應該對這種矛盾心知肚明，但是他們



就只依公文命令來指導，對於結果不負責任。無論是技手或郡守，都為了逃避責任，而實施荒謬的政策。不過這也就是台灣官吏的常態，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只是胡志明從中看到官僚的不知變通，以及官方行事的刻板制式。後來才知道到了每年的插秧時節，都有農民被警察帶走罰跪在水泥地上，強迫其施行正條密植（第四篇，頁53）。

## 五、對日本人心日本精神的疑問

胡志明更對要植入台灣人身上的「日本精神」本身投以疑問。

### （一）退出國際聯盟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胡志明對親近的米店老闆說明自己的見解，認為日本人的日本精神極為單純幼稚，根本不是一般常識所能理解的。

之前日本代表參加國際會議，與世界各國鬧翻後歸國。但歸國之際卻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歡迎的人與被歡迎的人，他們的心理都不是一般常識所能理解。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人那無可救藥的樂觀。在我們看來，如果只是去跟人吵架，那麼不用派代表，派個小孩去不就得了？

肩負外交任務者在花費大把預算後，讓世界各國覺得不快，居然還以此為能事，完全不見愧悔之色，反而自認為英雄凱旋歸國，這不就是日本人的天真嗎？一方面不承認自家的失敗，反而認為這是外交英雄的表現，完全不將國家安危置入考慮，這裡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幼稚。這種幼稚叫做日本精神。他們都或多或少被這種鎖國式世界觀的日本精神所魅惑。……本來日本精神就是一般常識難以理解的，比如說看電影，丹下左膳、宮本武藏的劍一出鞘就必然要有人頭落地，普通人看了應該會覺得太殘忍而生憐憫之情，但他們則是連婦女小孩看了都會拍手叫好。我們會怕死，他們則是對於有目的的死感到高尚。從這些非人性的地方可以看出所謂的日本人的性格以及共同性。（底線為筆者所加。第五篇，頁2）

## （二）後藤新平銅像的撤除

胡志明在公園目睹後藤新平的銅像被撤除，然而一旁的日本人卻完全無動於衷，至此胡志明再度感到日本精神的脆弱與幼稚，對於日本人的精神結構感到困惑。

一看才知道有四五個工人，正在將後藤新平的銅像拉下來，這也可以看做是銅像的上戰場吧！……現在卻被視為是殖民政策的罪魁禍首，五花大綁後被押解離去。看到銅像的下場，胡志明不由得在心中大喊痛快！為此想再看清楚些，所以特意移近距離。卻只見兩三個本島人女學生以驚異的表情看著，往來的人群都裝作沒看到似的走過。連象徵著殖民政策成功的後藤新平的銅像都要被撤除，對於這件事情全無反應的日本人，胡志明怎麼都無法理解；才知道這原來是只要一紙傳單就可以自由操縱的民族。報上連日出現玉碎的報導，卻沒有人掉下一滴眼淚。只要是為了自己民族的發展，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真是可怕的人種。想到他們總是使用華辭美句老王賣瓜地自我宣揚，對於本島人動不動就說恩情，實在令人厭惡。但是想到他們很快都會像眼前這個銅像一樣被押解離開，胡志明忽然覺得至今的憂鬱都獲得抒解，有一種莫名的愉快。（底線為筆者所加。第五篇，頁 55-56）

## （三）火車中的爭奪座位

在雜誌停刊的整理工作都完成後，胡志明在開往故鄉的火車中目睹了日本女性在車廂中爭奪座位的鬧劇。胡志明因而察覺到日本精神的脆弱。

胡志明的身旁，一個年輕的太太與老闆娘從上車時就開始因爭奪座位而喧嘩。老闆娘像風俗女郎一樣塗抹厚重的脂粉，年輕太太則從其說話的樣子可知大概是有點地位的官員夫人。老闆娘說已經先用行李占了位置，太太則說位子尚沒有人當然可以坐下，兩個人豎起眉毛，以尖銳的聲調誰也不退讓的爭吵。太太一直強調丈夫的地位，但老闆娘根本不把



她放在眼裡。後來太太就不甘心的哭了起來。周圍只要有點常識的日本人都皺起了眉頭。在戰爭的庇蔭下動不動就自稱是本島人的表率，那往臉上貼的金紙在此刻都剝落殆盡，浮現出本來的醜態。胡志明感覺到那自稱擁有三千年歷史的民族優越感，就在此刻，在本島人的面前無可奈何的露出本性。（底線為筆者所加。第五篇，頁 56-57）

## 六、胡志明的戰局批判、反戰思想

胡志明自始至終堅持其對戰爭的批判態度。不僅在被徵召為海軍軍屬而赴廣東的船上，他想到「霧社事件時為了鎮壓而召集鄰近部落的蕃人當前鋒」，察覺「現在自己也被以同樣方式利用」；尚有對於希特勒、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他稱希特勒為「在膨脹的野心中忘記了人生、抹煞了愛、是超越人類的怪物」，而納粹則是「最為露骨的標榜民族主義，在帝國主義中自我封閉，即使在戰爭中獲勝，戰敗後也一定會破滅」（第四篇，頁 64）。而「納粹德國是民族性的帝國主義，為了自己民族的發展別無他顧，為了稱霸世界不惜舉國發動戰爭」；對於日本，則認為其民族性與德國「如出一轍」。關於蘆溝橋事變與太平洋戰爭，則認為「這次的戰爭絕不是真正為了人類而戰，神明一定會將最後勝利賜予為人類有貢獻的一方」（第五篇，頁 3-4），預見了日本的戰敗。

台灣開始施行志願兵制度，不但在學校與青年團之間吹起志願熱，台灣青年也同時被強迫前去志願從軍。其結果即是在一九四二年有 425,961 名、四三年有 601,147 名、四四年有 759,276 名<sup>10</sup>的台灣人申請為志願兵。但這樣大量的數字，事實上並無法保證所有的志願兵皆出於本人意志。

胡志明的弟弟志南被訓練主任要求申請志願兵，因為不從而被關禁閉，被責罵、被罰跪在水泥地上。最後被告知「時勢不能容許你有自己的想法」、「早點作會比較輕鬆的，再不從會更加難熬，你還是乖乖聽話吧！」因而簽下了志願書。看到得知此消息的母親眼眶含著淚水，胡志明感到「一陣黯然的心痛」（第四篇，頁 61-63）。

<sup>10</sup>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東京：刀水書房，1996 年 2 月），頁 372。

另一方面，姪子達夫在思想被洗腦後從學校回家，告知雙親自己從事志願兵的決心。身為皇民奉公運動前鋒的父親志剛當然大為贊成，但其母親卻因擔憂而欲阻止。被託付以勸說任務的胡志明聽達夫口中說出的盡是與新聞社論並無二致的標語「我們青年應成為大東亞戰爭的人柱，為了十億同胞而戰」。因而胡志明對達夫說明國家已經將歷史與思考加以扭曲，戰爭如果不是發自善心則毫無意義，最後給予「只要實踐無為不協力即可」的建議（第五篇，頁 65-70）。

在台灣同時存在著即使知道一己的無力，但仍願面對國家權力做出微薄抵抗的青年，以及不加深思即積極合致於國家權力的青年。胡志明認為「人類所能安居的社會必須是詩的、美的、哲學的。必須同時兼具真、善、美」，「只有能依自己的能力得到自由平等的待遇」才是真正理想的社會（第五篇，頁 69）。對於胡志明而言，戰爭是絕無法接受的，因而自始至終堅持反戰思想。

## 七、胡志明對知識分子的批判

有一天，胡志明應友人佐藤所邀一同前往「豺狼大本營」——台北帝國大學。用胡志明的說法，這裡的教授包括大學校長在內，都是「文字層面的御用商人」，他們極力鼓吹「如果不杜絕台灣話就不能成為日本人」的主張，同時「皇民奉公會的顧問也都是這裡的大學教授」。胡志明說明以種種方式壓榨台灣人的皇民奉公會，其源頭即是台北帝大，而台北帝大對於台灣人的歧視格外強烈。

皇民奉公會對於台灣人而言是精神榨取的源頭，身為學者不可能不知道。但卻……。雖說身為殖民地早被注定被壓榨的命運，但任何壓榨都比不上精神上的壓迫。能夠安之若素的學者必然具有豺狼以上的素質。沒錯，這個大學的文政學部裡確有狼族。教授、副教授、講師加起來不在少數。其中明明只要有一個人道主義者存在就夠了。擁有千人以上的學生，但其中本島人只占一學部的三到四人。明明是用本島人的錢所蓋的大學卻不收本島人，對於這種情形不覺得不妥的學者，他們的良心都麻痺了吧。如果有良心就不會寫御用論文了。然而……（第五篇，頁 49-50）

而像是正條密植、寺廟整理等政策，胡志明認為這些台灣人在肉體上、精神上的苦痛都來自於台北帝大。

像正條密植這種要台灣全島的土地都以同樣間距插秧的不合理方式，大學農學部明明知道卻沒有半句反對，實在不可思議。根本是利己主義。寺廟整理也是一樣，文政學部明明清楚卻假裝看不見。是啊，這裡的學者裡面確實沒有幾個有良心的。如果有良心的話不至於會明明知道卻還安之若素。但他們確實每天都在不公平殘酷的現實背後過著悠然的日子。而且還可以在六百萬的本島人面前裝出道貌岸然的學者模樣，這種無恥的程度真讓胡志明驚訝。(第五篇，頁50)

關於正條密植，在《アジヤの孤兒》中只以「這裡的農學部卻沒有半點異議」帶過，關於台北帝大的種種批判在《アジヤの孤兒》中都被省略。在《胡志明》中吳濁流所欲表現的，是在批判總督府政策的不當性之同時，也對視若無睹的大學教授群以及知識分子們加以沉痛的抗議。

另一方面，看到教員們必須開始從事不熟悉的農事，對他們抱以同情。然而又覺得這根本是自作自受，在苦笑中察覺到矛盾。

仔細一看才發現是弱不經風的教授們辛苦地揮動著鐵鍬。真令人不忍目睹。聽說他們是要種地瓜，要將雜草叢生的荒地開墾成農地。那樣的土地長出來的地瓜大概是像白色的胡蘿蔔大小吧。

現今的日本正面臨思想戰的危機，不正是御用學者大展威風的時候？但卻只見他們投筆從農，為了博取當局歡心不惜汲汲營營，那醜態連胡志明看了都不免苦笑。同時卻也感到自己的一絲矛盾。(第五篇，頁50)

大學教授終不免淪為皇民化政策以及戰爭本身的犧牲品。

## 八、胡志明對迎合時局型台灣人的批判

作品中出現一個任意割取別人田中稻草的牛車夫。稻田主人發現後加以斥責，卻遭牛車夫回道：「我現在不是車夫了，是軍方奉公班的人。你對我割

草有意見嗎？如果有意見去向軍方反應啊！」(第五篇，頁 63)。典型狐假虎威的行為。

還有一個改了姓名的台灣人技工，對於被徵召前來鋪設飛機滑行道的台灣人，完全不加以指導而只是一味要求其重複鋪設。有個農夫即感歎這人「那種刁蠻的樣子，連人都算不上！」「本島人就是這樣子，只要有了公職就六親不認了，不是走狗是什麼？」(第五篇，頁 63)

這種「走狗」的代表，正是胡志明的兄長志剛。胡志明先是有預感任保正的志剛在成為「○○○的走狗後會開始作威作福」，又看到他「根本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當起模範青年順應當局要求而滅私奉公」，「與庄長、派出所大人走在一起大概是他最大的誇耀與樂趣」，「總是率先躬行公所的指導方針，作保甲民的典範」。在胡志明看來志剛那「不是塊讀書的料子，中學落榜了好幾次」的頭腦，已經「被宣傳單給塞滿」，聽不進胡志明的話了(第五篇，頁 12)。

志剛對於「生活改善運動」甚為熱心，對他而言那是可以自傳統台灣生活轉換為日本式生活的契機，因此率先穿起和服、吃起和風口味的烏龍麵；在大廳設起了神棚、掛出日式掛軸，意圖從外表開始抹去台灣人意識而成為日本人。妹妹秋雲曾揶揄穿著和服的兄長夫妻說：「哥哥，你那和服短得像相撲選手穿的呢。嫂子如果日語不進步點，會讓人錯以為是下女呢。衣服的領子歪了一邊像什麼話呢？」(第四篇，頁 18)

志剛也率先改了姓名，從其他也改姓名的公所同事口中聽到「論學問，胡志明是在你前頭；但是改姓名的方面，保正先生可就獨步胡家了」、「還是作哥哥的了不起啊！」的諂媚話語，「笑得連嘴巴都合不攏」。胡志明則是在被勸說改姓名的種種好處時裝糊塗，內心覺得：「為什麼大家都不去追究本質，而只為形式所惑呢？」而看到穿著和服的志剛妻子在以生硬的日語跟人打招呼後立刻躲回家裡的模樣，對這種滑稽的光景加以「這也是新體制下的悲歡交集吧！」(第四篇，頁 38-39)的諷刺。

志剛認為保正的地位是一種榮耀，因此付出絕大代價要成為日本人，對於皇民化政策的推動積極協力。在為了黃金的供出，不只對於一般村民，連自己

母親的手環與耳環都要強奪之際，妹妹秋雲忍無可忍的罵出「呸！大國民（走狗）！愚太郎！」（第四篇，頁 11）。

而在因精神病發而自海軍召集歸返的胡志明返家時，相對於其雙親與妹妹因至少平安歸來而欣喜，志剛卻覺得「實在太丟臉！」而到所有相關人士處道歉。妹妹秋雲看了同樣加以「呸！逐臭之夫！愚太郎！皇民先生！」的謾罵，胡志明本身也覺得「哥哥那皇民先生的嘴臉真讓人心寒」（第四篇，頁 37）。

為了皇民奉公運動而滅私奉公的，也不止志剛一人。阿春伯家的贅婿因為白米供出而上吊自殺。他因為稻穀供出量不夠而被警察下獄責罰，被產業課長辱罵拷打，在無法支撐的狀態下只好簽下再次供出的承諾書。然而出獄後想到「根本不可能還有稻穀可以供出，卻在承諾書上簽字，回家後大概也免不了責罵」，內外交攻之下終致上吊自盡。在農民的談話中，提到「庄長是手腕高超的台灣人，為了自己的地位富貴逢迎諂媚在所不惜。」即使被當局視為模範，但卻是以皇民化為名目欺壓農民的大惡徒（第四篇，頁 58-60）。

無論是志剛，或鄰庄長，這些居於一般台灣稍微上位的台灣人，在欺侮同樣是台灣人的時候全無罪惡感。他們被皇民化所洗腦，被錯誤信念所導，為了成為「有用的日本人」而不加考慮的學習「日本精神」，同時蓄積一己的財富。對於這樣的人，胡志明始終抱以不快與輕蔑之感。

## 九、胡志明無為非協力的生存之道

徵召胡志明為海軍軍屬的徵召令突然來到，即使周圍都以「恭喜」、「好好做！」、「為了國家盡力！」來激勵或祝賀，但這對他而言卻是「知道無法逃避卻還是想找其他出路」的關口。而他所得出的結論是效法三國時為孝順母親而不得不歸曹的徐庶，即使身在曹營，也終生不獻一計的「消極行事」（第四篇，頁 23）之策略。在船中胡志明發誓「即使一個人也好，用自己的力量幫助同胞」（第四篇，頁 26）。

但想起母親「怎麼可以跟同祖先的人們戰爭呢？」話語的胡志明，卻同時浮現了霧社事件（一九三〇年十月）之際，日本人利用同樣原住民部屬於戰列



前線之事，不禁愕然。原來自己與那些原住民一樣，都是被用來鎮壓同族同胞的替死鬼。想到自己仍是在日軍運用下的棋子，不禁為自己的無法自主而悲哀。

他突然想到霧社事件。當時為了鎮壓而徵召鄰近部族原住民為前鋒而戰。這是所謂以夷制夷的戰術，而今天的自己也在這樣的策略中被利用了。他不禁握緊拳頭，流下無以名之的淚水。(第四篇，頁26)

原本胡志明所思考的「消極行事」，在戰線上是毫無用武之地的。然而抵達廣東的胡志明，在目睹中國人被斬首的瞬間失去意識。持續發高燒，精神狀態不穩定的他被送回台灣。藉由在戰線一無貢獻而歸，胡志明可說在無意識中還是實現了「消極行事」的理念。

在胡志明的心中，終於從「消極行事」發展為「無為非協力的生存方式」。他向友人宣稱：

我們不能只是批判。沒有伴隨著實踐的批判毋寧是有害的。……其實是有不罷工也能達成罷工以上效果的方法，那就是所謂的無為不協力。無為不協力不是不服從，而是要服從。但是在服從的同時打從內心不協力。無論被命令要作什麼都說好，但是絕不去實行。即使實行也不做出任何成果。這樣的話反而能從內部導致崩壞，化消極為積極，那結果就會出人意料了。(第四篇，頁54-55)

## 十、轉而積極行動的胡志明，與其發狂

胡志明「無為非協力的生存之道」終於有了親身實踐的一天。

那是在目睹被勞務奉公班徵召的志南，因過重的勞動與不衛生的環境而發病，終至臨死之際，志南悲歎：「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認命呢？早知終歸一死……」之後，胡志明在悲痛之餘也回想起自己無力卑微的一生。他發出「這正是實踐無為非協力的時刻了！」然而他的思考在「現今的社會情勢之下是不可能實踐無為非協力的，因為那必須要將本島人領導階層洗腦才行。在那之前必須先策劃在思想上影響他們，要實現思想的影響必須要有組織性的行動」等之間輾轉

反覆。要實踐無為非協力，就像空襲必然會產生死者，是必須「付出犧牲代價」的。胡志明呆住了，他感到一陣驚恐，那戰慄逐漸成形，使他的身子不住發抖」（第五篇，頁 73-74）。

在志南遺言的迴盪中，胡志明終於採取了行動。

他突然全身血液倒流，腦中一片渾沌，想在房間裡來回不停繞圈，胸中像是撕裂般劇痛。耳中像是吹奏鎮魂曲的喇叭在大聲鳴響著。胡志明終於開始在房間裡反覆繞圈，又衝進書房拿出毛筆衝往胡家家廟的方向。  
（第五篇，頁 73）

可以說胡志明是因為志南的話語而跨出了這一步，在家廟的牆壁上寫下具攻擊性的言辭：

驢呀驢呀意如何  
奴隸生涯抱恨多  
橫暴蠻威奈若何  
同心來復舊山河  
六百萬民齊蹶起  
可將熱血為義死（第五篇，頁 74）

又對著聽說胡志明發狂的而前來一窺究竟的村民說道：

頭家是大哥  
大哥是賊頭  
人剝皮  
樹剝皮  
山也剝皮（第五篇，頁 75）

聽到這樣的話語，村民因此開始設想自己或也有因受壓榨而發狂的一天。



放眼望去，山上一片光禿，相思樹、桑樹、麻樹的皮都被剝光殆盡。他們想到，雖說人皮還未被剝，但卻因為供出而比被剝皮還慘，而且也像被剝光了一樣，快要連衣服都保不住了。(第五篇，頁75)

而描寫斥責前來看熱鬧的小孩的母親，以及其他村民時，都寫出他們紛紛在腦中揣想己身被逼到絕路而發狂的樣子。

老闆娘看著阿凸，大聲斥罵：

「死孩子，你在作什麼！」

「看瘋子。」

「瘋子？你草割完了嗎？」

「……」

「還沒？！你這個笨蛋！樹皮、油麻子、月桃、草都還沒去採嗎？你不怕派出所的大人是不是？你這個不孝子，想看瘋子的話老娘先變成瘋子給你看個夠！」

這時站在一旁的人都像被打醒了一般，想到自己受苦到今天，居然還不能發瘋真是不可思議。(第五篇，頁78)

瘋狂前的胡志明，對於社會與民眾的一舉一動皆能以精準的眼光觀察，下正確的結論。實踐「無為非協力」是他所決定的生存之道，然而卻在志南話語的刺激下，胡志明決意採取行動的瞬間發狂。只是，胡志明的發狂並非特例，在當時的必須為國家犧牲奉獻身心所有的情況下，誰都有可能在極限狀態之下瀕臨發狂崩潰。這點從村民聽見斥責孩子的母親的話語時的反應可以明確看出；然而遺憾的是，關於這部分的描寫在《アジヤの孤兒》亦不見蹤影。

然而，胡志明真的是發狂了嗎？無論是寫在牆壁上的言辭，對村民的吶喊，都不只是狂人的魔語。其與至此胡志明的想法並無二致，更無一絲矛盾。胡志明僅是將多數台灣人密藏於心不敢吐露之言說出口，其心境並無一絲異於常人之處。胡志明的心跡，不過是在表明被當權者剝奪人權蹂躪欺侮，以致一無所有的台灣人的共通憤怒，也正是吳濁流己身的怒吼。

哈哈哈哈哈

看哪！

動物園裡有老虎

拿破崙與成吉思汗跟牠關在一起

隔壁的鐵籠子裡

關著豐臣秀吉、山縣有朋、凱撒

哈哈哈哈哈

真有趣！

大家看哪！

新的籠子裡

希特勒、Goebbels、墨索里尼、寺內壽一、東條英機被綁在一起

每個人都戴著老虎面具

就像吃人肉的蠻夷一樣

都瘋了。

你父親 你丈夫

你兄弟 你子孫

都是為了那傢伙……。

那傢伙不知道為什麼口口聲聲叫嚷：國家，國家！

那種人才真的有問題！（第五篇，頁 75-76）

以及

用國家的力量

貪圖自己的榮華

道德喪失的傢伙

這些白日土匪

殺人明明要判死刑

那傢伙明明殺那麼多人

還被稱讚是英雄！英雄！這是怎麼回事！？

白癡！

老虎。

野狼。

聽不懂嗎？

胡志明還罵道：

白癡！

說什麼同胞同胞

你根本是走狗

皇民先生

模範青年

模範保正

什麼東西

都是白癡！（第五篇，頁 76-77）

事實上，這部分的前半（至「那種人才真的有問題！」為止）在《アジアの孤兒》中是被刪除的。在新人物往來社版本的《アジアの孤兒》中加入了「每個人都戴著老虎面具」以後的部分，「動物園」的畫面則仍然不見。因此動物園中除了老虎，尚有「拿破崙與成吉思汗跟牠關在一起」、「隔壁的鐵籠子裡關著豐臣秀吉、山縣有朋、凱撒」、「新的籠子裡希特勒、Goebbels、墨索里尼、寺內壽一、東條英機被綁在一起」的部分只有出現在《胡志明》中<sup>11</sup>。在《胡志明》中戰爭發起者德國、義大利與日本的「希特勒、Goebbels、墨索里尼、寺內壽一、東條英機」被以指名道姓方式批判，然而到了《アジアの孤兒》之後卻全不見，因而這些對古今著名的暴君獨裁者的強烈批判被模糊失焦，只見意義不清的狂人吼叫，僅存的只是對甘為日本人所用，反過來加害於同胞的台灣人「皇民先生」、「模範青年」、「模範保正」的批判。

---

<sup>11</sup> 中文版傅恩榮翻譯《亞細亞的孤兒》中重新加入了一部分，但篇幅與新人物往來社《アジアの孤兒》相同。只見動物園中關著拿破崙，而沒有希特勒與東條英機也綁在一起的描寫。

第二天，胡志明「跑出家廟，在被軍方占用的魚池與房屋前所貼的紙條上，——寫上白日土匪字樣」。所謂的「白日土匪」，是胡志明母親在被檢舉私藏食糧之際，對公所職員怒罵時使用的詞彙，也是其臨終前所發的言語。胡志明對利用權力而強占台灣人財產的軍隊稱之以「白日土匪」，因為理應是保護國民生活與財產的總督府，卻默許軍隊橫行，此不啻為「白日土匪」行徑。胡志明的批判上起壓榨逼迫台灣人於死境的獨裁者及當權者、知識分子，下至假借當權者威權中飽私利之「皇民先生」一類台灣人。這也正是吳濁流本身的沉痛心聲。

幾天後胡志明不知所蹤，而作者吳濁流則寫道：

啊！胡志明終於發狂了。

只要是有心的人，誰會不發狂呢？

在這段於「自序」中亦出現過的著名文字中，《胡志明》則是出現在胡志明不知所蹤的最後部分。本來做為胡志明發狂之後一連串高潮迭起之畫面，以這句話來收尾最為合適不過，但遺憾的是《アジヤの孤兒》中的這句話也消失了。

## 結語

透過胡志明的視線，吳濁流將日治下的台灣社會以冷澈眼光作了最詳盡的描寫。這是一部在書寫的同時並不知是否有問世可能的作品，然而吳濁流卻展現了最大的堅忍與耐心。

作品中批判對象廣及日本政府之政策、軍國主義、總督府之台灣治理策略、皇民化運動等日本人；以及盲從於政策與時代風潮的台灣人。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同時批判了只做為旁觀者，即使有再多再強烈的批判，也只能委身於無為消極生存之道的自己。

但其實吳濁流仍是積極而具自主性的，為求精神上的安定而記錄了己身的生活，此正是寫作長篇《胡志明》的動機，也是貫穿《胡志明》的主題。

從以上所述可知，吳濁流以日本統治期的台灣為中心，以殖民地所產生之支配與被支配的種種問題為具體題材寫作。在權力之下橫行霸道的支配階級、

以台北帝大教授為代表的牆頭草知識分子、為了一己的榮達而犧牲同胞的台灣人、以及被長期壓迫無以翻身的台灣人等種種人物，都在台灣此一「平面世界」中，藉由種種事件被極力刻畫，作者也在其中尋求己身的精神皈依。

然而吳濁流更在尋求安身立命之處的心境驅策下走出台灣此一「平面世界」，將眼光放遠至日本內地、中國大陸、甚至西歐等廣闊的「空間世界」，正因這樣的寬闊眼界與實際經驗，使其得以視德國希特勒為野心家，批判其為「超越人類的怪物」，而將「最露骨標榜民族主義」的納粹，預言其「即使在戰爭中獲勝，戰敗後也一定會破滅」。對於日本，則認為與德國的民族性「如出一轍」，二國共同擅長的突襲戰術「在總力戰中沒有絲毫價值」、「太不科學」，預言了日本的戰敗。更同時為被做為日本殖民地而在國際間被孤立化的台灣在「空間世界」中找到定位。

另一方面，吳濁流對由古至今的「時間世界」亦呈現了歷史性的思考。由拿破崙、成吉思汗、豐臣秀吉、山縣有朋、凱撒到現代的希特勒、Goebbels、墨索里尼、寺內壽一到東條英機，延續的時間中野心勃勃的征服者總是反覆出現，禍及廣大民眾。只是即使獨裁者出現，必不能長久恣意為行。日本現在正在作戰，但節節敗退終將失敗。然而歷史必將重演，新的獨裁者又將現身，屆時「新的御用學者御用文人亦將出現加強其好戰的聲勢吧！」然而吳濁流對於理想社會的企求永不休止。即使在「時間世界」中，也祈求能尋得能堅持不為權力所動以尋覓安身立命之所在。

小說《胡志明》，因此不僅是一部描寫日治時期台灣的作品，而可以是提供思索人類歷史與空間問題的小說。

※吳濁流長篇日語小說《胡志明》將於二〇〇七年春，由東京綠蔭書房復刻出版。